

宋 遗 民 词 选 注

沙 灵 娜 选 注

巴 蜀 书 社

一九九五年·成都

前 言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为之歌唐，曰：‘思深哉！’……自邠以下，无讥焉。”季札于十五国风中的十三国风均有评论，对邠风及曹风则因其国家小作品少而不加评论，不评论也即是不重视的意思。——近些年出版的文学史及宋词选本对宋遗民词人和词作谈及与评论很少，肯定的更少，很有些季札观乐“自邠以下，无讥焉”的味道。但是，假如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那一特定时代有很多有价值的词人和词作，要是不认真去评论、给以允当的评价，对于宋词研究，无疑有遗珠之憾。

宋朝是中国古代史上延亘较长的一个王朝，从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到1279年南宋灭亡，历时319年。宋朝又是一个国力始终衰弱的王朝，北宋从立国之初就处在异族欺凌的威胁之下，而终于被女真族建立的金国所灭。高宗赵构建立偏安江左的南宋小朝廷后，对金国称臣称藩，献土纳币，苟且偷安。自高宗以下的历代南宋帝王几乎无一例外地继承高宗的投降国策，其间虽也曾有两次北伐的举动，却如划过夜空

的流星，一闪之后即归于沉落。总起来讲，南宋百余年的时间是与金国保持着“对峙”的局面的，朝廷上下宴安于自然条件优越、自然风光佳丽的江南，歌舞嬉游，醉生梦死。正如宋遗民词人王沂孙在一首《贺新郎》词中所说：“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直到1234年（宋理宗端平元年），南宋重蹈宣和海上之盟的覆辙，引狼入室，与强大的蒙古族建立的元政权结盟灭金，致使蒙古灭金后即大举南侵，节节进逼、步步深入，南宋的繁华梦才被击破。但其时政治黑暗，国家步履艰难，不仅难于挽回败亡的厄运，连苟延残喘亦不可能。临安终于在1276年（宋恭帝德祐二年）陷落，三年后南宋便彻底亡国。

蒙古族原是散居塞外沙漠地带的游牧民族，强悍勇武、文化落后。元人统一中国后，实行残酷的高压奴化政策，元统治者把国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西夏、回族、西域以及留居中国的部分欧洲人）；第三等是汉人（包括契丹、女真和原在金国统治下的北方汉人）；而原属南宋的汉人被列为最下等，称作南人。元朝明文规定高级官吏只能由蒙古人担任，其次是色目人；南人除极少数为元朝打天下出过力的卖国求荣的奸佞之辈，在新朝取得一官半职外，其余绝大多数南宋旧臣或文人墨客都备受歧视和压迫，地位是极其卑下的。爱国诗人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说：“滑稽之雄，以儒者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嗟呼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郑思肖《大义略序》则说：“鞑（蒙人）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虽然这两种说法略有差异，但文

人，尤其是南方文人的地位十分可怜可悲是显而易见的。宋遗民词人的命运当然并不例外，因此他们对于异族统治的仇恨和愤怒，以及破国亡家后的悲哀伤痛，也就不能不是十分深剧的了。爱国的宋遗民词人既不愿屈身仕元，又不能忘怀故国故家，便只能寄情于文字，以表现他们内心的郁积。从思想内容来看，宋遗民词有许多或隐或现地表现爱国感情的篇章，值得我们重视，从艺术手法来看，由于宋元之交的特定政治环境，造成了宋遗民词深隐曲折、多用比兴寄托的特点，在词的艺术发展方面也有相当的贡献，是不能忽视和轻视的。

宋遗民词人生活在南宋亡国前后那一可悲的历史时期，身受家国沦丧的惨祸，成为最下等的亡国之民，他们的喜怒哀乐必然超越了自身的成败得失，而系于整个民族的命运。在国家将亡未亡之际，文天祥这一类爱国词人，一方面坚持抗元，一方面在词章中表现对国家命运的极度关心和自身志节的坚贞。在国家既亡之后，亡国奴的命运已无可改变，大多数爱国词人只能以遁迹隐居、不仕新朝来表现他们的反抗，并写出许多充满爱国情感的动人篇章。我们称这些词人为遗民词人。也有少数词人迫于情势与生计，或出为学官，或曾应召入京，这样的人历来遭到一些非议，如王沂孙，被指责为“宋末失节词人之一”（胡云翼《宋词选》）；又如张炎，被认为是“准备向新王朝屈膝的”（同上）。叶嘉莹先生在《迦陵论词丛稿·碧山词析论》一文中说：“关于宋遗民之出仕……中国传统的士人对于出仕为朝官与出仕为学官，是有着不同的看法的。清代的全祖望在其为宋、元之际的名学者王应麟的画像所写的一篇《宋王尚书画像记》中，论及王应麟在宋

亡以后曾应召为山长一事，便曾说：‘山长’非命官，无所屈也。箕子（殷商遗民）且应武王之访，而况山长乎。’今人孙克宽教授撰《元初南宋遗民初述》在论及被列为遗民的标准时，于‘宋亡后隐居不仕不与新朝合作者’一项之下，关于出仕新朝之看法，也曾特别注明云：‘乡学或书院教授不在此限。’——叶先生的这段说明，我们认为是合乎道理的。王沂孙一度出为学官旋即归隐，张炎被征入朝未仕而返，他们并没有趋奉新朝以求富贵，是不应指责为“失节”或“政治上动摇”的，何况他们的许多作品表现了深挚的故国之思和身为亡国之民的无告的苦痛，唱出了那一时代的哀歌，我们认为他们是无愧于“宋遗民词人”的称谓的。

宋遗民词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文天祥（文天祥死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姑且把他算作宋遗民）、刘辰翁、汪元量为代表的爱国词人。文天祥本是抗元英雄，兵败被执，囚于燕京四年，任凭元统治者百般利诱威逼始终不屈，被杀害时年仅四十七岁。文天祥的诗文主要反映他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大节不亏的崇高品质，流传下来的词作只寥寥数篇，篇篇充满了忠义刚正之气，动人心弦。例如，他在被俘北上途中写了《酹江月》“乾坤能大”一词，把自己比作志向高远的蛟龙，并说自己“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显示了尽忠报国的英雄本色。再如，文天祥对度宗昭仪王清惠所作《满江红》一词不满，因为王清惠词“问姮娥，于我肯从容，同圆缺”几句含有苟且偷生的意思，因此作了一首和词，并在小序中说和词的用意是“庶几后山《妾薄命》之意”。文天祥有感于自己事宋未得建立功勋而宋亡，于是借陈后山（师道）感曾巩知遇之恩，作《妾薄命》诗表示愿相从于地下的

心意，来和王清惠的词，词中说“世态便如翻覆雨，妾身原是分明月”，表示文天祥忠贞报国明月般皓洁的心志。在另一首代王夫人所作《满江红》中，他又说：“想男儿慷慨，嚼穿龈血”，“算妾身，不愿似天家，金瓯缺。”再度表明他以身殉国的志节。它如《沁园春》〔至元间留燕山作〕一词，是文天祥经过张巡、许远双忠庙时所作，他对在唐安史乱中坚守睢阳，壮烈牺牲的张巡、许远，表示了高度的景仰和赞美，全词充满了堂堂正气，词语豪壮，掷地作金石声。这些词作，几百年来激励了无数爱国志士的斗志和精神，是宋遗民词中最可宝贵的珍品。

刘辰翁是宋末杰出的爱国词人和著名的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从蒙古灭宋至元政权趋于巩固的过程。宋亡后刘辰翁隐居不仕，凭吊故都临安，谋葬殉国的故相江万里，表现了深切的爱国感情。他的作品词情慷慨，寄托深远，抒写对故国永不能忘情的深沉眷恋，对元人统治的切齿痛恨，凝聚着爱国遗民的血泪。

宋理宗、度宗朝，奸相贾似道把持国政十年之久，媚敌卖国，以谎报军情邀功请赏，蒙古兵围襄阳数年，贾却隐匿不奏，终日在西湖葛岭赐第中纵情声色。及至元兵即将渡江，贾才被迫出师鲁港，还没见到敌人就吓得全军溃退，致使元兵渡江，国势垂危。刘辰翁对此极其愤恨，他有一首《六州歌头》题为〔贾平章太师督师至太平州鲁港，未见敌，鸣锣而溃，后半月闻报，赋此〕，在这首词里，刘辰翁以嬉笑怒骂、冷嘲热讽的方式痛斥贾似道误国。其时贾尚未被弹劾，刘辰翁敢于大胆斥责当朝宰执，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终宋一代，以词的形式直接反映时事的篇章屈指可数，因此这样的作品除

了它的思想艺术价值之外，无疑还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

刘辰翁题为送春、春感、有感、感怀的词章有数十首之多，春秋的代序、节令的更迭，引起词人的万千感慨，而这些感慨全然脱去叹老嗟卑和一般伤春悲秋的滥调浮词，所发的全都是深沉的家国兴亡之叹。如《兰陵王》〔丙子送春〕，写在元军占领临安的当时。词中借春归无路寄寓亡国之恨：“送春去。春去人间无路。……春去，尚来否。正江令恨别，庾信愁赋。……叹故国神游，花记前度。……”真可以说是句句悲咽、字字血泪。因而《词统》引卓人月评此词：“即以为《小雅》、《离骚》可也，填词云乎哉？”卓人月是把这首词当成可以同“风”“骚”并举的经典作品的。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题是‘送春’，词是悲宋。曲折说来，有多少眼泪。”厉鹗论词绝句则称作“送春苦调刘须溪”，可见词人浸透在词章中的爱国感情极深，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刘辰翁《青玉案》〔用稼轩元夕韵〕、《江城梅花引》〔辛巳洪都上元〕、《宝鼎现》〔春月〕、《永遇乐》和李清照词、《恋绣衾》“当年三五”、《水调歌头》“不成三五夜”等词，都以故国昔日的繁华欢乐对比目前的悲苦凄清，写来十分凄婉动人。在《永遇乐》“璧月初晴”一词小序中，词人说：“余自乙亥（公元1275年，宋恭帝德祐元年）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李清照在北宋亡后虽经流离漂泊，毕竟南宋还保有半壁江山，刘辰翁遭遇的却是亡国奴的命运，自然“悲苦过之”。刘辰翁词中所描绘的宋亡前的元夕是这样的欢乐景象：“杵歌串串，鼓声叠叠，预赏元宵舞”（《青玉案》），是“望不尽、楼台歌舞，

习习香尘莲步底。箫声断、约彩鸾归去，未怕金吾呵醉。”（《宝鼎现》），是“当年三五舞太平。醉归来、花影满庭。办永夜、重开宴……”（《恋绣衾》），宋亡后的元宵却是异样的凄凉：“今晚上元何处度。乱山茅屋，寒炉败壁，渔火青荧处。”（《青玉案》）、“几年城中无看灯。夜三更，月空明。野庙残梅，村鼓自春声。”（《江城梅花引》）——以上几首作品只将今昔的悲欢作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却绝对不能说词人只追念从前的歌舞游乐，词人是借此表现对故国生活深深的怀恋，更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的一份特殊感情。刘辰翁的很多词章都显示了对敌人的深恨和对故国的深爱，无论是对花见月，无论是别亲送友，即使是听见黄莺啼叫这样极平常的生活小事，词人也总要联系和归结到故家故国之思，这样的爱国感情可以说是融入了词人的生命之中，它代表了宋遗民最可贵的民族精神。

在艺术方面，刘辰翁的作品特点是“风格遒上似稼轩（辛弃疾）；辞情跌宕似遗山（元好问）。有时意笔俱化，纯任天倪，竟能略似坡公。”（况周颐《蕙风词话》）刘辰翁的笔力雄健奔放，“多真率语，满心而发，”即用比兴，用意也较为显豁，不注重雕章琢句，使事用典也较自然。他的佳作很多，像《柳梢青》[春感]、《兰陵王》[丙子送春]、《永遇乐》“璧月初晴”、《沁园春》[送春]等，都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很好的佳作。

另一位爱国词人汪元量，本是宫廷琴师，临安城陷后，随太后嫔妃被俘北去，流落燕京十二年，后自请为道士南归。他的诗歌反映了宋亡前后的真实情形，被称为“宋亡诗史”。他的词虽不如诗慷慨激烈，却更凄恻感人。有些词章对因骄奢

淫佚至于灭亡的南宋朝廷，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如《六州歌头》[江都]、《莺啼序》[重过金陵]等词，借六朝及隋代故事讽刺、斥责昏聩的南宋统治者：“销魂，当此际。君臣醉，貔貅弊。事如飞。山河坠。烟尘起。风淒淒，雨霏霏。草木皆垂泪。家国弃。竟忘归。笙歌地。欢娱地。尽荒畦。”这些词句有如支支利箭，无一不对准误国亡身的南宋君臣。汪元量还有许多词作描写了被俘北上的宋旧宫人旅途的艰辛和苦楚，并写出她们入元后眷怀故国故宫的深情，如《水龙吟》[淮河舟中夜闻宫人琴声]、《满江红》[吴山]、《忆秦娥》八首等。这些作品使我们看到宋旧宫人任人宰割的不幸命运，和这些旧时代里薄命的宫廷女子心中怀有的一份爱国之情。

汪元量是谢太后御用的琴师，地位极其卑微，但却是极有气节的义士。他的诗歌有好几首斥责谢太后向元朝奉表请降而不肯与国家共存亡的奴颜婢膝。他的一首《婆罗门引》词，题为[四月八日谢太后庆七十]，借祝寿讥刺谢太后，词的下片说：“行年已休，岁七十，又平头。梦破银屏金屋，此意悠悠。几度见青冢，虚名不足留，且把酒、细听箜篌。”词中以昭君不肯事匈奴自投黑水留下青冢的传说，来反衬谢太后乞降苟活的可耻。清万斯同《宋季忠义录》引《浙江通志》说汪元量在元朝宫廷曾有高渐离谋杀秦王之志，而未能实现。汪留燕京时又曾谒见被执在狱的文天祥，勉励天祥死节。文天祥很看重他的人品和诗文。李鹤田《湖山类稿跋》称赞道：“元量以一供奉琴师，不预士大夫之列，而眷怀故主，始终不渝，宋季公卿，实视之有愧，其节概不可及。”

总起来讲，像文天祥、刘辰翁、汪元量这一类词人的作品，具有最充沛的爱国感情，而在艺术表现方面较为明朗奔

放，继承了苏辛的豪放词风。其他词人如柴望、家铉翁、文及翁、何梦桂、王奕、邓剡、刘壘等，词风与文天祥、刘辰翁等人相类似。如家铉翁《水调歌头》[送陈正言]：“耿耿孤忠磨不尽，惟有老天得知”，“我节君袍雪样明，俯仰都无愧色。”何梦桂《八声甘州》[送王野塘北归]：“愿君如游龙万里，我如云、终泊此林丘。”这些意气昂扬的词语，表现了他们不事新朝的坚贞志节，代表了南宋汉民族的凛然正气，这类作品是宋遗民词中最有思想价值的部分。

另一类宋遗民词人如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他们在宋亡后或隐居山林，或曾被迫一度做过学官，或曾赴朝廷征召，但都没有甘心屈事新朝。由于原本的社会地位、家世环境以及思想品格，他们与文天祥那样以身殉国、名垂千古的民族英雄固然不能相比，以作品中反映的爱国感情的强烈程度来说，也比不上刘辰翁、汪元量这一类词人。但是他们作品中所表现的对故国的无限缱绻之情，那种无可消释、无可更易的哀怨之思，也同样是爱国感情的流露，虽不慷慨激烈，却也凄恻动人。

周密是这群词人的领袖人物，他的年龄最长，宋亡前曾做官，宋亡时已四十七岁，入元后他隐居不出，怀着亡国之痛，以故国文献自任，辑录家乘旧闻，著《齐东野语》、《癸辛杂识》、《武林旧事》等书，成为有宋一代野史家的巨擘。周密工诗善画，《宋史翼》又说他：“乐府妙天下，协比律吕，意味不凡。”《宋遗民类集序例总目·宏文集序》说：“至其刻羽引商、应弦赴节，览荒凉之宫殿，梦里繁华，游消歇之湖山，尊前老大，迄今读 洲之谱、草窗之词，如听开元旧曲”。又戴表元《周公谨弁阳诗序》曾说周密“晚年展转荆棘霜露之

间，感慨激发，抑郁悲壮，每一篇出，令人百忧生焉，又乌乌然称其为垒臣羁客也。”《弁阳集》为周密晚年所编总集，已佚，而《草窗韵语》（诗集）及《洲渔笛谱》（词集）皆结集于宋亡前，使我们无法了解周密诗词作品的全貌，这是十分可惜的。

周密曾结吟社于西湖杨氏环碧园。宋亡后，他与王沂孙、李彭老、张炎、仇远、王易简等十四人结社作词，分咏龙涎香、白莲、莼、蝉、蟹等题目，隐指宋亡后六陵被元人盗发、摧毁事，以寄托亡国哀思。清高士奇《绝妙好词选序》说：“公谨所作音节凄清，情寄深远，非徒以绮丽胜者。”如他的《一萼红》[登蓬莱阁有感]一词作于宋恭帝德祐元年（1276年），这时正当宋亡前夕，国势岌岌可危，词人登上会稽蓬莱阁，一时万感交集，赋此词抒发千古兴亡之慨和忧时伤世的心情：“故国山川，故园心眼，还似王粲登楼。”词中又表示他不愿为新朝效力而将归隐林泉的志节：“好江山，何事此时游。为唤狂吟老监（贺知章），共赋消忧。”这首词被认为是他的压卷之作。宋亡后周密的一些词章充满了亡国哀思，如《水龙吟》[白莲]：“擎露盘深，忆君凉夜，暗倾铅水……”《天香》[龙涎香]：“一缕旧情，空趁断烟飞绕……怅东阁、凄凉梦难到。”《齐天乐》[蝉]：“故苑愁深、危弦调苦，前梦蛻痕枯叶。……枝冷频移，叶疏犹抱……”这些词章借咏物隐指发陵事，表现对故国、故家梦绕魂萦的一片深情。周密的《高阳台》[送陈君衡（允平）被召]及《忆旧游》[寄王圣与]对陈允平的赴召和王沂孙出为学官表示不满。他的《玉漏迟》[题吴梦窗霜花腴词集]、《杏花天》“金河琼苑曾经醉”、《三姝媚》[送圣与还越]、《献仙音》[吊雪香亭梅]、

《探芳讯》〔西冷春感〕等词，都将故国之思和身世之慨结合起来，感情哀怨深长。周密词清丽绵邈、刻划精细。如《高阳台》〔寄越中诸友〕一词中表现无家可归的极其深重的愁情，却使用这样清新绵邈的语言：“梦魂欲渡苍茫去，怕梦轻、还被愁遮。”写来虽如毫不经意，却有着万钧之力。又如一首《水龙吟》中用“新烟换柳、光风浮蕙”八个字将词人对于时序变迁的细微感觉和春天繁丽芳馨的景象充分地描写出来，语言精致而又简炼。我们认为周密的词作无论是内容还是艺术方面，都有许多可资借鉴的东西。

另一位词人王沂孙为清代词评家张惠言、周济、戈载、陈廷焯等人推崇备至，周济将王沂孙作为宋词四大领袖之一，说：“碧山胸次恬淡，故《黍离》、《麦秀》之感，只以唱叹出之，无剑拔弩张习气。”陈廷焯对碧山词评论最高，他说：“王碧山词，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感时伤世之言，而出以缠绵忠爱，诗中之曹子建、杜子美也。”这些评论虽嫌过于溢美，但说碧山词深含君国之忧是不错的，他特别擅长以隐晦曲折的艺术手法，通过咏物来抒写亡国的哀痛，寄托自己的深情厚意，确实有“言近指远”的特点，耐人寻味。王沂孙的《天香》〔龙涎香〕、《水龙吟》〔白莲〕、《齐天乐》〔萤〕、〔蝉〕诸篇，使事用典，浑化无迹，比周密同样题目的作品更觉意味深长、曲折尽情。又如《眉妩》〔新月〕一词，词人以月缺暗指亡国：“叹慢磨玉斧，难补金镜。”末几句：“故山夜永。试待他、窥户端正。看云外山河，还老尽、桂花影。”借盼望月圆表现词人希望恢复故国河山的心愿，因此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这首词表达了王沂孙“一片热肠，无穷哀感。”其它如“自真妃舞罢、谪仙赋后，繁华梦、

如流水。”（《水龙吟》〔牡丹〕）、“当时无限旧事，叹繁华似梦，如今休说。短褐临流，幽怀倚石，山色重逢都别。”（《齐天乐》〔送秋崖道人西归〕）、“谁在旧家殿阁，自太真仙去，扫地春空。”（《庆清朝》〔榴花〕）、“国香到此谁怜，烟冷沙昏，顿成愁绝。……试招仙魂，怕今夜、瑶簪冻折。携盘独出，空想咸阳，故宫落月。”（《庆春宫》〔水仙〕）——这些词句都寄寓了深沉的故国今昔之慨。其它如《扫花游》〔秋声〕、《醉蓬莱》〔归故山〕、《齐天乐》〔四明别友〕等词，表现宋亡后王沂孙深深感到的那种物换星移、恍若隔世的惆怅落寞，和一度曾为学官的悔愧心情。

与周密、王沂孙互相唱和的另一位词人张炎，本是贵公子，六世祖是南宋名将张俊，曾祖父张铉和父亲张枢都是著名的词人。张炎生长在一个盛有园林歌姬、文艺气氛很浓的钟鸣鼎食之家。宋亡时他三十二岁，家资丧尽，四处飘泊，常同一些前朝遗老如周密、郑思肖等交往。四十三岁时曾被元世祖召往大都缮写金字藏经，旋即不仕而归。张炎说自己“生平好为词章，用功逾四十年”，他一生推崇姜夔，与姜齐名，号为“姜张”。张炎的词，旋律美妙，腔调流动，用字和谐，咏物词尤胜擅场，曾因咏孤雁、赋春水绝妙而被人称为张孤雁、张春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炎生于淳祐戊申（1248），当宋邦沦覆，年已三十有三，犹及见临安全盛之日，故所作往往苍凉激楚，即景抒情，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非徒以剪红刻翠为工。”并说他于宋元之间为“江东独秀”。这种评论是比较公允的。

抒发亡国哀思是张炎词作的主要内容。宋亡前夕，张炎过西湖庆乐园作《高阳台》一词，写出国难家愁带给他生活

巨变的感触，和吊古伤今的无限愁情：“欢游转眼惊心，”“故园已是愁如许，抚残碑、却又伤今。”另一首《高阳台》，描写的西湖景色不是太平时的明丽风光，而是元人铁骑过后的残山剩水，面对着“一抹荒烟”的故都，词人说自己“无心再续笙歌梦，掩重门、浅醉闲眠。莫开帘。怕见飞花，怕听啼莺。”从这里见出张炎清醒的人生态度和江山易主后的沉痛感情。有人认为这首词是张炎写得最好的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相当的高度。

张炎曾被召入元大都，虽然不仕而归，却因此遭到许多非议，有些文学史家或词评家认为他“是准备向新王朝屈膝的……”（胡云翼《宋词选》）、“不能洁身自爱，竟然北上求官，虽失意南归，终于造成了政治上的污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这样的一些指责是并不符合事实的，因而不是不公正的。张炎北上途中和南归后写的一些词章都表现了他不愿出仕的心情，如《凄凉犯》〔北游道中寄怀〕一词说：“谁念而今老，懒赋长杨，倦怀休说。”他不愿学扬雄向汉成帝献《长杨赋》，不愿为新王朝效力。词中又说“待击歌壶，怕如意、和冰冻折。”极写自己的无可奈何和怨怒不敢形于色的忧惧心情，整首词的情调是凄楚沉咽的，完全没有奔竞者对于名利的想望和求索。张炎一再在词中表示要“载取白云归去”（《甘州》），满足于“闭门约住青山色，自容与、吟窗清绝。”（《疏影》），又说：“烟水自流心不竞，长留霜空。”（《浪淘沙》）这些词句都证明张炎无意求取功名富贵而自甘淡泊的情怀。

张炎的咏物词刻划精微、寄情深远，艺术上达到穷极工巧的境地，《南浦》咏春水、《水龙吟》咏白莲、《解连环》咏

孤雁、《探春慢》咏雪霁、《绮罗香》咏红叶、《真珠帘》咏梨花，都是他咏物的名作佳篇。如《解连环》〔孤雁〕：“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自顾影、欲下寒塘，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边。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料因循误了，残毡拥雪，故人心眼。谁怜旅愁荏苒。谩长门夜悄，锦筝弹怨。想伴侣、犹宿芦花，也曾念春前，去程应转。暮雨相呼，怕蓦地、玉关重见。未羞他、双燕归来，画帘半卷。”——这首词达到了咏物的极致，他形容失群的孤雁“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并以此比况自身的漂泊孤凄，令人触目惊心。词中又用暗喻的手法，表示词人对被俘北上守节不屈的故人的忧念，并代他们写出家国愁思，十分委婉缠绵，有令人寻绎无穷的意味，却并不流于晦涩。正如他自己在《词源》中所主张的：“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他的咏物词都是下了惨淡经营的苦功夫的，内容绝不浮薄空泛，语言又多创新，含蓄有致，寓意又并不晦昧，是咏物词中的上品。张炎的词作有许多警句极为后人所称道，除上举“写不成书，只寄得相思一点”，又如“杨花点点是春心，替风前，万花吹泪。”（《西子妆慢》）“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清平乐》）“三月休听夜雨，如今不是催花。”（《清平乐》）这些词句清新蕴藉，凄怆缠绵，很富有情韵。张炎的词作无论从思想内容或艺术风格来讲都比周密和王沂孙丰富，语言更多创意出奇，尽管总起来讲还是显得较单薄，因为他究竟不是苏、辛那样的大名家、大手笔，但在同时代的词人中，他却是一位佼佼者了。

词风与周密等人相近的还有李彭老、仇远、王易简、唐珙等。限于篇幅，就不一一评论了。

另一位出色的宋遗民词人蒋捷，作品的内容与风格较多样，各种风格都有佳作，如《贺新郎》“梦冷黄金屋”、《贺新郎》[兵后寓杭]、《女冠子》[元夕]、《声声慢》[秋声]、《一剪梅》[舟过吴江]、《虞美人》[听雨]等，或沉郁、或豪放、或疏淡、或质朴、或轻灵，有的接近苏辛，有的接近姜张，表现了他转益多师的特点。

有人批评周密、王沂孙、张炎这一派词人的作品“内容显得空泛、游离”，“不过是一点微弱的呻吟罢了”，“故国之思……不是呼之欲出，而是隐而不显”，（见胡云翼《宋词选》）这样的判词未免过于偏颇，孟子说：“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批评者脱离了这派词人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而以对现代人的要求标准去衡量古人，这样词史上能够被肯定的作家实在也就寥寥无几。确实，周密等词人的笔调委婉曲折，感情低徊掩抑，他们多用比兴寄托的手法通过咏物或寄友，来抒写自己的凄楚幽怨之情，因为这其中有不得已的苦衷。清况周颐《蕙风词话》责备杨慎《词品》批评詹玉的词没有黍离之感，他说：“当元世祖威棱震叠，文字之狱，在所不免，第载籍弗详耳。凤林书院《草堂诗余》无名氏选至元大德间诸人所作，并皆南宋遗民词。多凄侧伤感，不忘故国，而于卷首冠以刘藏春、许鲁斋二家，以文丞相、邓中斋、刘须溪三公继之，若故为畦町。当时顾忌甚深，是书于有所不敢之中，仅能存其微旨，度亦几经审慎而后出之。”况周颐认为詹玉《齐天乐》词末句“如此湖山，忍教人更说”看似平淡，却含有无限悲凉，并说詹玉“犹为敢言”。和詹玉相比，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人词中表现的国亡后的凄怆惨恻之情要深沉得多，是不能简单地贬斥为“微

弱的呻吟”的。

我们知道，北宋词少寄托，即令偶有，不过是抒发仕途的失意、个人身世的感慨。到了南宋，只剩下半壁江山，帝王昏愤，权奸当道，爱国之士不得申张复国大志，且又忧谗畏讥，不得不借比兴寄托隐约其词来表白自己的情愫，如岳飞《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便是典型的作品。宋亡以后，元人的统治十分残暴严酷，大多数怀有爱国情感的遗民词人只能把他们对于时事的忧伤、家国沦亡的哀感，极其隐晦曲折地表现出来，因此宋末大量出现深有寄托的咏物词，以求“言近指远”而又能全身免祸。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说：“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习俗。”他又说：“的确，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阳春三月千花百卉争奇斗艳，炎夏芙蕖盛开，秋季桂子飘香，凛冽的冬日却连一小朵野花都难以生长。怎么能够要求在元人铁蹄下的精神的冬天里，让词人们唱出慷慨激昂的或是豪健明朗的歌曲呢！假如没有南北宋之交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尖锐斗争，假如没有广大民众要求抗敌复土的激烈行动，就不可能产生李光、赵鼎、张元幹、张孝祥这些人的爱国主义歌曲。而假如没有南宋时金主完颜亮南侵激起的各地义军的反抗，假如没有孝宗初即位时政治较为清明和一度曾锐意北伐，也就不可能出现辛弃疾这样代表民族意志的时代歌手。是的，宋代词坛上诚然有过反抗侵扰、恢复神州的呐喊，但那也的确只是黑暗王国闪过的一线光明。南宋将亡之时和既亡之初，抗元英雄文天祥发出过民族的正义呼声，在他的词章中主要表现了他尽忠于宋王室、舍身取